

大革命时期

浙江的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

潘念之

我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从宁波到杭州，至一九二七年七月离开，在杭凡一年又六个月。这段时间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党的组织活动和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工农运动迅速发展，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十分尖锐。当时杭州的革命运动就反映了这个形势。我在杭州是做统战工作的，对于通过国民党所作的斗争，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就从这方面出发，写出一些回忆。由于时间隔得久了，记忆有限，又未及查证文献资料，这个回忆写得不详，或者还有错误，请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指正。

（一）杭州党的组织情况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反帝运动波及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杭州党支部扩大成为地委，首任书记是华林。这年十月，华林调宁波，改由顾作之任地委书记，到一九二六年的六、七月间，由贺威圣继任书记（顾、贺之间，可能由张寅仲代理了一个短时期）。这年十一月，贺被军阀宋梅村逮捕杀害，由庄文恭兼任杭州地委书记，华林等任委员。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大约六、七月间，杭州地委扩大成为省委，由庄文恭任书记，卓兰芳、赵济猛等任委员。不久，主因病

请假去沪，中央另派张秋人前往接任。张到杭不久又被捕牺牲。此后杭州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组织屡被破坏，省委机关不久即移设于宁波。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间，浙江尚无全省统一的党组织。杭州、宁波、温州的组织都直接受江浙区委（设在上海）领导，经常到杭州指导工作的是庄文恭。但杭州是浙江政治中心，杭州地委对当时上层分子的活动和通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影响了全省。杭州地委所领导的地区，有嘉兴、湖州、金华、绍兴等地的支部和小组。杭州市内，在绸业工人、印刷工人、铁路工人、杭州电厂、武林铁工厂，以及医专、工专、一师、一中、女师等学校和小学教师等方面，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北伐军到杭州以后，组织更加发展了。

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不但机关、团体中党员不公开，也很少用党的名义发表宣言、传单。进行各种活动，多半通过党所领导的组织，如国民党、工会、学生会及其他团体来进行，党员有所活动，都以公开职业或所参加的社会团体的面貌出现，有的虽然是别人所知道的共产党员，但也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或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由于当时的国民党还是执行三大政策的革命联盟，而浙江国民党组织是由我党党员参加主持的，因而我们的许多政治斗争通过国民党来进行。尤其是北伐军到达浙江以后，各项公开活动，从省政府、人民团体、报刊宣传及各项群众运动，都在我党的领导下，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而形式上都由国民党出面。在当时形势下，这样做比较方便。因而那时的国民党工作，就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

（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建立和反对 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浙江的国民党组织是在我党的推动下，在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就开始活动的。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宣中华、俞秀松、沈定一等在杭州成立了浙江国民党筹备处，开始吸收党员，进行宣传活动，并在各县、市成立分支筹备处。曾推举代表出席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浙江成立了临时省党部，委员有宣中华、俞秀松、安体诚（宣、俞、安是共产党员）沈定一、经子渊等。书记是华林，秘书是王贯三（华、王是共产党员）。办公地点设在严衙弄。这时候，浙江尚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督军卢永祥既是段祺瑞的皖系人物，又同孙中山有一些关系，浙江的国民党得以公开活动。临时省党部成立以后，开始了政治活动，曾组织群众反对金法郎案、烧毁西湖的王克敏祠堂（王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先后成立了市、县党部的有宁波、绍兴、嘉兴、萧山、金华、温州等处。到了这年冬季，孙传芳赶走卢永祥，自任浙江督办。孙属于直系军阀，与广州政府相敌对，浙江国民党机关就无形停顿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广州国民党中央将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着选举出席大会的代表，沈定一在其萧山衙前的家中召开浙江省党部的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省党部的委员以外，有宁波、嘉兴、绍兴等十几个县、市的代表。沈定一为加强国民党右派（他们实际上当时已决定准备西山会议）的力量，还特别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戴季陶到会指导。会议中，以

沈定一为首（主要是临时省党部的成员）的右派和以宣中华为首的左派（主要是各县、市代表）有着紧张的斗争。宁波代表俞弁群甚至当场被沈定一禁止发言。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是否继续执行三大政策（联俄、联共和工农政策）和出席广州会议的代表人选。会议中，沈定一以首领自居，操纵一切，但由于出席代表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反右的空气甚浓，沈定一、戴季陶的企图并未得逞。结果经子渊、宣中华、胡识因当选。（宣、胡是共产党员）

衙前会议虽然作了一番斗争，但临时省党部实际上还是操纵在沈定一的手中，再加当时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甚为嚣张，企图攫取上海和江浙各省的组织，以对抗广州的中央左派。于是在我党的指示下，浙江国民党组织内的同志进一步推动反右派的斗争，以阻遏反革命逆流。

在衙前会议斗争的基础上，宣中华同志分别联系了左派县、市党部，争取中间状态的县党部（主要是平湖、海宁等），于十二月间由嘉兴县党部具名发电邀请各县、市党部在沪杭路的硖石镇东山公园开会，派代表出席的有宁波、镇海、慈溪、绍兴、诸暨、金华、海宁、平湖、湖州、嘉兴、永嘉等县、市。只有萧山、浦江等县党部，在右派把持之下，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两个决定：（一）由联席会议具名，发出了声讨西山会议派的通电；（二）否认为沈定一等所把持的原有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这给右派以沉重的打击。西山会议派认为沈定一所把持着浙江国民党组织，是他们的可靠资本，东山会议的出现，不仅严重动摇了沈定一的势力，也使西山会议派的以上海和江、浙两省为地盘来对抗广东

的计划行将成为泡影。

各县、市联席会议积极准备成立正式的浙江省党部。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在杭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大会（借湖滨民众教育馆演讲场为会场），选出宣中华、潘枫涂、丁济美、韩宝华、郑采丞、宋敬卿、童志沂、张寅仲、陈维俭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查人伟、朱少卿、戴某某、张葆灵、张柳生等五人为监察委员，成立正式的省党部，得到广东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执行委员中，选出宣中华、潘枫涂、丁济美为常务委员，领导省党部的工作。推定王贯三为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在头发巷十五号。这些工作是在党的杭州地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上海江浙区委并派了庄文恭到杭州指导一切。

这时候，右派的国民党机关仍旧存在（地点在小车桥），它上面被广东中央所否认，下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群众，无法活动，只是一块空招牌。但左、右派的斗争，并未停息。不久以后，他们向军阀孙传芳告密，封闭头发巷的左派机关，逮捕了几个职员。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他们做了蒋介石的走狗，更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和左派国民党员。

（三）夏超独立和我们的工作

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到十月间，杭州工作在地委领导下，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国民党组织，有很大的开展。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直接由地委领导，反对军阀，宣传北伐，联系上层分子、进行策反工作，是用国民党的名义来进行的。当时宣中华常住上海，丁济美在平湖本籍，浙江国民党的工作由潘枫涂、王贯三具体负责。国民党的主要工作是扩大和建立各县、市党部：已经筹备

的，正式建立起来；没有的，开始筹备。这时新成立的有嵊县、上虞、余姚、建德、临海、平阳、富阳、桐庐等县；同时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具体内容是反对军阀）。

大约是在六月间，头发巷十五号的国民党左派机关由于右派分子的告密，被军阀政府封闭了，捕去了住在机关内部的职员朱楚珩和陈文祺二人。潘枫涂和王贯三因住在外面未遭逮捕。于是一面营救被捕同志，一面另找地址建立机关。这年七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形势日趋紧张，浙江军阀压迫共产党、左派国民党和青年进步分子显得日益凶恶。共产党机关原来是秘密的，这时候更加警惕，国民党左派机关也转入地下了。

当时，浙江是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的统治之下，孙本人驻在南京，浙江督办卢香亭的部队在江西前线对北伐军作战，浙江政务由省长夏超掌握。夏是警官出身，在浙江拥有一部分势力，这时他利用北伐形势，投向国民党，借国民党以排斥孙、卢，在浙江酝酿独立。我们利用了这一形势，十月间在平海路的浙江教育会成立杭州各界联席会，动员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要求承认国民党的合法地位等口号。工会和其他人民团体都自动组织起来，宣传工作广泛展开，杭州的政治空气活泼起来了。在这次运动中，江浙区委仍派庄文恭到杭州进行指导。

到了十月间，夏超和孙传芳的冲突爆发了。孙传芳派兵回驻浙江，夏超匆促宣布独立，派他的警备部队沿沪杭路向北拦截。夏超在政治上毫无进步要求，只玩了一下手段，当他和孙传芳争夺地盘时才借国民党来壮自己的声势。临到了宣布独立的一天，

临时向国民党省党部借去一副青天白日 and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国民党的党、国旗），但也未曾挂起来。他的部队在枫泾和嘉兴之间受到孙传芳部下宋梅村部队一击，就溃退下来。到了形势十分险恶的时候，他临时又派人来要我们组织敢死队，替他督战。那时候我们虽已有工人纠察队的准备，因为形势很坏，事实上无法挽救夏军的溃散，没有出动。到了十月二十一日（或是二十二、二十三日，记不清了）晚间八、九时，宋梅村部队孟昭月旅已经开入杭州城。夏超直到这时才知全局溃败，仓皇出走，在松木场被宋军所俘获。

宋梅村部队到杭州以后，进行严厉镇压，搜捕革命人士，上层活动分子避居上海，我们的活动又转入地下。这时杭州各中等学校严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积极分子被监视，那里的共产党员、活动分子不得不暂时掩蔽起来。党仍然组织群众，散发传单和开展各种活动。反动军阀的便衣警探驻伺街口、工厂和学校门口，甚至站在邮筒附近（因为我们曾经用邮寄的办法送传单），曾有同志被捕。

大约是十月二十七日，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同志和国民党杭县党部常务委员汪性天同志（共产党员）被捕了。在这以前，曾由党员余心租住城站仕学旅馆的一个房间（当时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多住寄宿舍或旅馆）作为地委的联络处。因为地委的一个交通员被捕了，敌人追踪到联络处，那天贺威圣同志在联系工作中被捕了，汪性天同志则同日在其寄住的亲戚家中被捕的。这使杭州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时在各方面作了布置以后，由潘枫涂到上海向江浙区委报告，并请上海的全浙公会的褚辅成、宁波同乡会的魏炯等浙江绅士设法营救。但十一月三日，

贺、汪两同志即被宋梅村匪部所秘密枪决牺牲了。（同时被捕的季连材、余心在北伐军到杭州后出狱，此二人在后成为托派。）

贺威圣、汪性天两同志牺牲后，江浙区委派庄文恭兼代杭州地委书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则调俞弁群（共产党员）任杭县常委，继续展开活动。这时形势更紧，工作更艰苦了。

（四）在北伐军到浙江以前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形势有了巨大的发展。北伐军已经进占武汉、南昌，并且迁都武汉。上海举行工人起义，汉口、九江工人纠察队收回了租界，湘、鄂、赣各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内的右派活动，已由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转移到以蒋介石、陈果夫为中心。蒋介石当时驻军南昌，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以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等为代表）相对峙。蒋介石大批招收旧军阀，通过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竭力向长江下游（苏、浙、皖、闽等省）发展，以扩大他的地盘。这时浙江仍旧在孙传芳的统治之下。浙江本地原有两师军队，都归孙传芳指挥，但矛盾是很大的。第一师师长陈仪，主要部队驻在徐州一带，第二师师长周凤岐，主要部队驻在江西。这两师各有一部分队伍留驻浙江，第二师的一个团驻在钱塘江上游，第一师的一个团驻在绍兴、宁波一带。这两部分部队并不完全服从孙传芳和卢香亭的调度，宋梅村的部队虽然驻守沪杭线，控制了杭州，但广大的浙东地区，还是空隙，我们就在这中间开展了活动。

这时期党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工人运动，举行了罢工斗争，并

进而组织了纠察队，曾有队员百余人，有枪几十支。在北伐军到达以前，曾在松木场一带和宋部溃军接触，并在市上维持治安。当北伐军薛岳部到杭州，纠察队前往迎接，反而被缴了械。

在浙江军队方面，通过国民党组织，和陈仪、周凤岐都有过联系，鼓励他们响应北伐军。后来北伐军进浙江以后，这两师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师称十九军、二师称二十六军）。其他如地方团队和警察也有一些联系。

十一月间，宣中华同志到了南昌，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并商定了浙江的政府组织，把人员都任命了。宣中华返沪以后，就着手组织政府。这些委员曾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议，商定在北伐军到达以前，先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开展工作，迎接北伐军。那时绍兴、宁波一带的驻军是浙江第一师的石铎部队，和我们有联系的。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除了留一部分同志在杭州坚持工作外，一部分同志到绍兴、宁波一带发动群众，展开宣传工作。省政府委员曾有多人到了宁波，但不久因宋梅村部下段承泽旅过江进驻绍兴、宁波，石铎部退台州一带，省政府未及成立就撤退了。宣中华、潘枫涂等回到上海，作了一次研究，把人员分成三个方面，王贯三带一部分同志留驻杭州，维持机关工作，准备北伐军到达后的公开工作；宣中华率领一部分同志往温州布置工作；潘枫涂率领一部分同志往金华组织力量。后来因往金华的路不通，绕道江西前往，事实上是和由江西入浙的北伐军同时前进的。

这时在江浙区委领导之下，杭州、宁波等地的工作都开展得很快，尤其是宁波，在工人和农民运动方面有较大的开展，也团结当地的上层民主分子，对以后北伐军到达以后的斗争，打下了

很好的基础。

（五）几个月的政权斗争

北伐军进入浙江的部队是何应钦、白崇禧所指挥的东路军，辖曹万顺军，薛岳、严重两师，和浙军第二师改编的周凤岐廿六军。薛、严两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反共色彩很浓厚。但浙江国民党的组织仍是原来的地下组织，在我党的领导之下，省政府是北伐军到达以前所任命的。全由浙江当地人所组成，没有军人参加，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因此当时的政治斗争，我们是以国民党组织为武器，同新到的右派集团间展开的。

北伐军到杭州以后，左派国民党机关（沈定一的小车桥右派组织早在夏超独立以前就收场了）和民众团体都公开活动，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和游行，各方面的工作都迅速开展。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旧省议会办公，设组织、宣传、职工、农民、商人、青年、妇女各部，由常务委员三人主持，常委宣、潘、丁三人分兼宣传、组织、农民三部，此外由张寅仲任职工部长，郑采丞任商人部长，宋敬卿任青年部长，胡识因任妇女部长。秘书长仍由王贯三担任（其中除丁、宋二人外，都是共产党员）。

省政府设了三个单位，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是决定政策方针和重大工作计划的机关，由张静江任主席，张未到前由蔡元培代理。委员有宣中华、韩宝华、褚辅成、陈其采、蒋梦麟等等。一个是政务委员会，是行政机关，由褚辅成任主席，沈钧儒任秘书长，褚辅成兼民政科长，查人伟任建设科长，朱兆萃任教育科长，魏炯任司法科长。委员有潘枫涂、马叙伦、

庄崧甫、王廷扬等人。三是财务委员会，是管理财政金融的机关，由陈其采任主席，陈未到前由周枕琴代理。委员有丁眉荪、张葆灵等人。这些人的政治派别是这样，共产党员：宣中华、潘枫涂；国民党省党部左派：韩宝华、查人伟、朱兆萃、丁济美、张葆灵；浙江地方绅士、中间派：褚辅成、沈钧儒、魏炯、王廷扬、庄崧甫；蒋介石反动派：张人杰、陈其采、周枕琴、蒋梦麟、马叙伦。其中马叙伦是策划反动阴谋的中心人物。国民党左派完全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地方绅士的褚、沈和共产党合作，魏炯也与我党保持一定关系。当时张人杰、陈其采二人尚未到浙江任职。所以当时省政府以左派力量占优势，工作上左倾的。马叙伦在十年后所写的《我在六十岁以前》中追忆说：“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我和蔡先生等都是‘散员’。”（马叙伦先生在后期，采取了与中共合作的立场，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

但在军队方面，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必说，周凤岐的二十六军也是投机的反动军队。军队政治部里虽有少数共产党员，可是对军队的指挥不起作用。极为重要的杭州公安局长却被何应钦抢先派了最反动的黄埔系分子章烈担任。其后这个公安局一直成为反动活动的大本营。（宁波公安局长在北伐军到达以前，先派共产党员许汉城担任，在工作上便利很多，但后来又被反动的警备司令部所撤换。）在军警单位的牵制下，省政府也成为“有职无权”（当时褚辅成语），做不了什么事。

虽然如此，我们的工作还是迅速地展开的。杭州的总工会组织起来了，尤其是铁路工会组织得比较好。学生会公开和扩大了，成为积极的活动力量。农民协会、商人协会、妇女协会也组

织起来了。反对土豪劣绅和减租运动展开了。各县、市的群众运动很发展，尤其以宁波的工会、农会开展了很好的斗争。在杭州、宁波等地，用国民党的名义办了《民国日报》，学校方面也派了党员担任校长，做了许多革命的宣传工作。国民党省党部于三月初召开了扩大会议，各县、市党部都派代表出席，对全省的国民党党务工作作了检查和布置，加强了我党的影响，巩固了左派的力量。同时还办了一个党务人员养成所，由各县、市选派几百青年来受训。国民党省党部派赴各县的党务特派员和政治监察员（前者指导县、市党部工作，后者指导县、市行政工作）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对于当地的革命运动起着积极作用。

随着革命工作的发展，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也更频繁，盘据在南昌的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派了四个人到浙江来捣乱。他们是郑异、萧铮、葛武梁、王宇春（后来王宇春和我们合作，在蒋介石发动政变时被捕杀）。他们勾结浙江原来的右派分子，分化勾结各县、市代表，和左派的省党部捣乱。但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前，他们的收获是很少的。尤其是各地的农民运动、打土豪和减租运动，使得反动派十分痛恨。形势一天一天地紧张了，反动派在积极活动，各地地主土豪和青帮流氓勾结起来，同国民党右派分子、反动部队相呼应，斗争显然表面化和尖锐化了。

不久，有了土木工人的“示威”游行。大约是三月二十九日，反动派收买了流氓歹徒，蒙骗少数土木工人，由反动流氓、四府同乡会（金、衢、严、处）的杜震芎率领，手持铁锤木棍，呼叫反动口号，在省政府和国民党省党部前游行，扬言要捣毁省党部和总工会。由于我们的严密戒备，没有发生事故。（在宁波，同

时有了流氓歹徒烧毁总工会办公处的事，同时其他各省也有了袭击工会的事，可见这个破坏活动是反动派有计划的行为。）

在这样情况下，宣中华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请示，派王贯三到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系。一方面在杭州作了一些应急措施。这主要是在工会和农会方面加紧工作，组织自己的力量，同时设法扩大团结，除原来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外，加强对省政府浙江绅士的联系，褚辅成、沈钧儒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庄崧甫、王廷扬、魏炯等鄙视马叙伦等阴谋政客，也比较同情我们。这措施，在杭州以外的其他各县、市也有所进行。

三月底，张静江突然到了杭州，他不到省政府办公，住在西湖的新新旅馆，和马叙伦等整天密议，我们派人去看他，他不接见。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们举行了群众游行，并在街上张贴了“反对昏庸老朽分子”（指张静江）、“打倒西山会议派”（指马叙伦）的标语。次日，张静江和蔡元培、马叙伦等到上海去了，那些在街上散发的标语传单却被马叙伦拿去向蒋介石作密告资料。蒋介石是找他们去策划反共屠杀的。（见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一〇六页）

四月十日晚上，杭州地委和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员负责同志开了一个会，商量应急措施。接着由国民党省党部约请省政府一部分同志会谈，大家感到形势更紧张了，要有些准备，并相约有什么消息相互通知一下。

（六）四·一一反革命政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有细雨，晨雾未散。同志们开始赴机关工作了。反动派以公安局的章烈为指挥，率领大批军警，分

头向国民党省党部、杭州市党部、总工会、学生会等公开活动机关和活动分子的住宅进发，包围、封锁这些机关和住宅，逮捕工作人员，凡当时已到机关，或尚留在住宅内的人员全部被逮捕了。机关都被封闭了，省政府也被封锁，禁止出入。杭州全城堕入白色恐怖中。

那时潘枫涂从寓所乘人力车赴省党部办公，在离机关大约五六百步，远远看到那边挤着一群人，有持枪的士兵数人把守着门（省党部原来没有岗哨）。因为连日消息不好，有所警惕，他就叫车子停下，站在车上远远看了一下，看到楼上人员来来往往，很是匆忙，情况和平日大不相同，知道事变已经发作了。于是他离车折入省党部前面小弄内的宣中华寓所。宣中华还睡着未醒，就把他叫了起来，把外边情况告诉了他。由于宣是最被注意的人，寓所又离省党部近，是不安全的，让他首先避开。宣走后，潘正在处置其余的人时候，地委书记庄文恭和委员华林来了，于是潘、庄、华三人在客厅上坐下来商量对策。正当这时，外面敲门声甚急，寓所内郑采丞同志因其爱人胡识因是省党部的妇女部长，为反动派所注意，不让她露面，自己去开门应付。进来的是一群士兵，来捕人的。当郑同志带着士兵上楼时候，胡识因即乘机脱身。客厅内的潘、庄、华三人匆促躲入室后复壁中，伏在暗角里。搜捕的士兵曾从窗口向复壁探视，因内部黑暗见不到人，他们就跑开了。寓所内除宣中华、胡识因二人已离开外，其余十多人，连同郑采丞在内，都被士兵带走了。他们走后，女勤务员关了门，一个人在客室吃早饭，这时整个房子别无动静，潘、庄、华估计士兵已走了，怕再迟又生事故，便推开壁门出来，从后门走出另一条小巷，约定晚间再谈，各自离开。这天晚上，他们又

会见了一次，会商了对策。当时工人正在酝酿罢工，因局势严重，为着避免过大损失，决定不作公开对垒，把平日露面较多的同志暂时隐蔽起来，各项活动都转入地下，工作重点移到工厂和农村方面去。第二天，经过一些转折，派唐公宪到金华，蒋本菁到宁波，干书稼往嘉兴到上海，向各地传递消息，组织联系。

这就是蒋介石所早已准备的“清党”——反革命叛变，大批地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活动分子。在上海是“四·一二”事变，在杭州和宁波则早一天，在四月十一日开始的。蒋介石在前几天还召开了所谓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跨党”分子案，并发电通缉上海和江、浙两省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六十余人。浙江的宣中华、潘枫涂两同志也都在内。各省市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都很多。

杭州除地委机关及部分同志不公开外，其余在国民党机关和民众团体工作的同志，除少数当日不在机关或临时脱出者以外，多数都被捕了。党外人士中，韩宝华、朱兆萃、宋敬卿临时躲避起来脱走了；褚辅成、沈钧儒、查人伟三人被扣在省政府。事变后，马叙伦衔张人杰的命，到杭州接收省政府，主张把褚、沈二老立即枪决。这不仅因他们二人靠近共产党，也由于他们在浙江的历来政治活动中和马叙伦等阴谋派不相协调的缘故。但褚、沈是浙江孚众望的有名绅士，当时的省府委员庄崧甫（蒋介石幼年时的老师），曾为此事指着马叙伦大骂：“无耻政客，戕害善良”。因而象章烈那样反动军人也有所顾忌而不敢下毒手。庄崧甫为了此事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经蒋电浙江伪省府把褚、沈二老送南京，就在南京释放了。几天后，查人伟也在杭州获释。

从此，浙江完全落入反动派手中。由张人杰、马叙伦、蒋梦

麟、邵元冲、黄人望、周凤岐等反动人物改组了省政府，张任主席，马以告密、献计、阴谋破坏，坚决反共有功，担任民政厅长。实际上，他掌握了整个省政府的实权。马叙伦和黄人望相勾结，任用私人，把持反动政府，声势煊赫，市人侧目，当时有“蚂蟥党”（谐音马、黄）的称呼。

原来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分子沈定一，这时与蒋介石相勾结，做了反动的浙江国民党的整理委员会主席，成为“清党”、反共的头子。他的党羽沈肃文、沈尔乔、钱西樵、孔雪雄、王超凡、施伯候、蒋鉴，以及马叙伦派的姜绍谟等都做了委员。钱西樵还做了特种刑庭的庭长，专门审判和杀害被捕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他们过去和左派仇恨很深，这时更疯狂地发泄其反共复仇的野性，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沈定一、沈肃文、钱西樵等亲自拷问，随意判处死刑。共产党员郑采丞、何赤华、姜天国，党外人士宣中禅（宣中华的弟弟）、王宇春等惨被杀害。宣中华同志在事变时隐蔽下来，第二天化装由艮山门躲上火车机头赴上海，在途中被反动派所识破，被捕送龙华的白崇禧司令部，终被残酷杀害。各地情况以宁波最为惨重，上海的流氓头子陈群、杨虎带着一批流氓到宁波审问革命人士，施用惨酷的肉刑和野蛮的斩刑，共产党员杨眉山（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王鯤（总工会主席）被斩首，共产党员胡焦琴（女）先被刺胸再枪杀。其他被杀的还有甘汉光（铁路工会负责人）、陈良义（南田负责同志）等。金华的钱兆鹏（共产党员）、义乌的张新境（共产党员）、嵊县的张本芝、华伦初等都被惨杀。地主、土豪、流氓都成为反动派的支柱，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工人、农民中的活动分子都是他们捕杀的对象，成千的人被投入狱中，很多农民

被地主挖眼割舌，火烧和活埋处死。

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反革命政变，使我党组织被破坏，党员被杀害，工作上受了很大的损失，各种活动都转入地下。（党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在四月十一日以后，仍保持秘密组织，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活动，直到七月间武汉国民党公开反共以后才完全结束。）但经过短期的整理恢复，工作又逐渐恢复并发展了，尤其是在农村方面，掀起了波涛壮阔的武装斗争，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九六〇年二月